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

古今之争

主编(现当代文学) / 郭志刚

罗成琰等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文学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

◎罗成琰等著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文学卷◎主编（现当代文学）／郭志刚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罗成琰等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5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ISBN 978-7-80742-151-1

I. 2... II. 罗... III. 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1328号

书系分卷名: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文学卷

分卷主编:郭志刚
(现当代文学)

书名: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

作者:罗成琰等

书系总责任编辑:李晔生

责任编辑:毛军英 杨剑敏 张国功

书籍设计:梅家强 王玲云 朱燕 李仲熙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网址:WWW.BHZWY.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5

字数:27.5万

版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90元

ISBN 978-7-80742-151-1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邓光东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的公元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最为复杂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最为急遽深刻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结束了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像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百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远涉重洋、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慷慨赴死,涌现出一个个思想巨擘、学术巨人、英雄豪杰、民族骄子,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活剧。一百年,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公元20世纪的中国,却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现象,既是

历史奇观,也是历史奇迹,是中国历史的壮举,为世界历史所罕见!它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坚强决心、非凡勇气、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伟大民族、优秀民族!

20世纪的中国之所以发生遽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打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经济基础的变革需要思想解放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因而纵观古今,放眼中外,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为先导,以百花齐放、学术繁荣为前奏。如果说,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适应并推动了社会变革,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则解放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那么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社会正是在各种思潮相互冲突、相互交锋、相互激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背景下发生急遽而深刻变化的。这个世纪的学术繁荣,是继春秋诸子学说之后的一个学术思想巅峰,其问题之复杂与纷繁、规模之巨大与宏伟、内容之丰富与新颖,又非春秋战国所能比拟,而其对社会进步影响之深远,则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

如今,20世纪渐渐远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然而,20世纪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当忘记的。这个世纪,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世纪,是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世纪,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世纪,也是最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清理和评估、反思和总结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从来没有中止过学习与实践、思考与奋斗、探索与拼搏;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有太多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痛、经验与教训。仅就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术领域而言,就造就了许多重要学术人物,涌现出许多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流派,进行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辩,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所有这些,像奔腾不息的江水,像璀璨明亮的群星,像振聋发聩的春雷,像熠熠闪光的瑰宝,汇成巨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所有这些,都

需要我们站在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门槛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回顾与反思、梳理与廓清。

哲学社会科学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学术,归根到底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晶。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时代的巅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性思维。中华学术,从来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问题,历来就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相联系。它既是一个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个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所谓纯学术问题当然存在,但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与政治挂钩,特别不主张学术问题政治化。但有些学术问题确与政治密切相关,尤其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相关。只要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 20 世纪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一次次学术论辩或学术争鸣,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 20 世纪中国在上述几个领域的学术论辩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详尽地占有材料,做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由表及里的工作。认真地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对经济、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历次论辩或争鸣,反思其是与非、成与败、功与过、得与失,寻找其发生的历史、社会缘由,探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彰扬前贤、昭告后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所幸的是,黄楠森、邢贲思、方克立,龚书铎、李文海,费振刚、

韩兆琦、郭志刚、田本相、倪震、梁茂春、邓福星诸同志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欣然分别担纲《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史学卷、文学卷、艺术卷主编，为本书系的学术品位和书稿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从1999年底开始就积极策划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经过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已将该书系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书系的作者和主编们为撰写书系，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翻阅了无数重要文献，耗费了许多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术界的不少专家，纷纷关注和支持该书系的出版。所有这些，令人感奋，令人欣慰。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是20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书系的作者们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论述方法及酣畅流利的文笔，努力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述评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介绍观点全面准确，叙述过程简明扼要，评论评价公正公允。全书基本理清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百年学术论辩主要问题的脉络；对所列论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析；以历史和全局的目光，对一百年来各种重要论辩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使人们对历次论辩产生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该书系是作者个人的科研成果，虽经主编们认真审校，仍属作者自己的作品，见仁见智，亦属自然。

值此书系陆续付梓之际，受各分卷主编的委托，写下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2004年11月

主编前言

郭志刚

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的一个分支,本卷试图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述有关论辩的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台。与论争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比,这个小小平台展示的空间和内容是有限的;不过,为搭建这个平台,本卷作者们却也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些还是人们平时不留心或不易看到的原始资料。就像面对一片广袤的森林,为了给读者提供进出这片森林的方便,是他们初步清理了现场,疏通了道路,设置了标志和路牌,庶几使壮游者不致探身丛莽,漫无目标。古人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话也可大体用在各位作者身上。总的来说,这是一项开启性的工作,相信它的粗率与幼稚,将和草创之功同时受到读者关注。当然,说到“开启”二字,我们不会忘记这套大型书系最早的策划者,是他们对这套书系进行了设计,完成了早期的许多铺垫工作,并给予作者们一试身手的机会。而我作为本卷的主编,也是在这套书系进行了一段工作之后才参加进来的。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各种变数的世纪。对于这些变数,中华民族一向十分敏感,因为它产生的各种正、负影响,往往深不可测,而其带有暴力倾向的冲击波,总是向弱者释放。这样,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大国,就免不了首当其冲。很久以来,我们就是在这些变数的压力下,度过了一个激流与险滩“层见错出”、光明与黑暗交相叠映的世纪,在我们民族(包括它的知识界)长期探索和奋斗的征

途中,我们几乎是鲜花与荆棘同时收获,战果与苦果一并咽下,以至于直到走出这个世纪的尽头,我们还面临着许多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其中也包括学术问题。这些,就是各位作者面临的现实。可以想见,为了辨别“鲜花与荆棘”这类的事,他们在主观上是尽了力的。但是,学术之路也是一条布满荆榛的探索之路,在这过程中,我们同样不会只收获玫瑰而没有刺儿。我们甚至不能拒绝失败,不得不吞下没有“战果”的苦果。说到底,我们在书中涉及的各种学术论争或学术研究,也是历史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我们民族在“动荡的百年史”中的精神追求,是同一伟大历史进程中错综复杂的实践活动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投影。正因如此,它的任何成果,不管是花与刺、是与非、正与误……都反映了在特定情况下实践的品质和实践的面貌。今天,当我们对这些历史的实践成果进行检验和归纳的时候,它们同时也在检验和鉴别着我们,看看我们的头脑是否足够聪明,功力是否足够硬朗,看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描述并回应了历史。因此,这将是一次挑战。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将注定要在挑战中接受考验,而考验是成长不可缺少的因素。

正如书系总序指出的那样:它的每一本书都是作者个人的学术成果。本卷自然也不例外。作为现当代文学卷的主编,我只是出了六个题目,即: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中西之争、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之争(此题经作者之一的陈言博士指正,已将“翻译文学”改为“文学翻译”)、20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此题大体按现、当代文学时段划分为两册);此外,看过作者们的提纲和部分初稿,提了些参考性意见。我的工作仅此而已。书是作者们呕心沥血的成果,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学术见解,而且反映了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经过积累和研究所达到的专业水平。对于这些书,无须我在这里多说什么,任何时候,实践都是最具权威的评判者,除了实践,没有谁能对作者们的学术成果做出最后的评判。换言之,一本书的诞生和流行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这个过程,因为它既尊重了作者的学术个性,也尊重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学术

有竞争,有竞争就有规则。实践既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也可以成为这里说的“唯一”规则,因为只有这个规则才能提供一个公正的视点,保障论辩各方永远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已经过去的论辩是这样,现在我们归纳和评析这些论辩,也就等于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论辩,这样,规范前人的规则也会规范着我们。这很公道,这至少是学术之所以被称为“公器”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此说不错,那么,所谓学术良知,它的最高体现就是公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震古烁今的名句,正是出自一颗至公至诚的大心。在漫长的学术探索的道路上,唯有此心是奉,摒弃私念和偏见,才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对于对手的“超越”,逐步接近真理的目标。在高境界的学术竞争中,没有不可超越的对手,也没有永远被别人超越的对手。作为后人,我们有“后来居上”的可以预期的优势,但预期不是“预约”,潜在的优势不会自行到来。各种结果都可能出现。譬如说,我们的书是向社会交出的试卷,它能打多少分,是对还是错,是及格还是不及格,最终只能在社会实践的熔炉中得到验证。不过,有一点是现在就应该清楚的: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实践行为,它既有时代的制约性,也有个体自身的制约性,因此,即使我们的著作成果实现了某种超越,它在学术进化的链条上,也只是一个等待别人超越的过渡环节。过渡性包含着不完整性,或者是一种“缺陷”;但反过来说,这种不完整和“缺陷”,正好暗示着学术发展的新的空间。可见,遵从学术规范办事,竞争在任何时候都是公道的。

在这套大型书系中,文学卷也许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属于现当代文学部分的这七本书,其时间正好紧扣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纪的同行演绎本世纪的历史,是世纪的目击者见证本世纪的生活(即使有时穿着古人的衣服)。虽然我们面对的常常是抽象的理论,甚至是枯燥而散漫的资料,但这个文学中的“20 世纪的人”,将如影随形似地跟定我们,因为这是文学,而文学就是“人学”,在那些理论和资料的背后,将不断出现文学中“人”的影子。因此,在 20 世纪学术论辩的舞台上,在演绎“人”这方面,再没有比文学更形象、更具有粉墨登场的舞台效果的了。“文学是人

学”的命题,会给我们的文学卷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

让我们回到20世纪。按照现在很多人习惯的说法,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的发现”。“发现”了什么呢?原来,从前的人都是为某种凝固了的偶像和观念而生,例如为“君父”而生,为“道统”而生,把忠君、事亲、卫道视为永恒不变的目标。这样,“人”实际上只是失去了个人独立性的某种附属物。现在不同了,文学革命的前驱者把“人”还原为自然的儿子,他是自身的主人,他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个性,不是谁的附属物。这一发现,从根本上颠覆了封建秩序及其道德体系,其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的发现有时也被称为“个人”的发现。据实而论,这一发现虽有本国的历史动因,其主体词却借自西方。在西方,发生于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不同程度地高扬人性解放和科学主义的旗帜,向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和教会势力发起冲击,要求人从宗法秩序和神学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一重新发现人、解放人的运动,在开发自由劳动力市场、促进贸易自由,以及为促进大机器生产而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体系等方面,恰好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简言之,发生于西方的这一对“人”的重新定义,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它反过来又促进了西方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体制性变化,可以说,它很漂亮地完成了一次关于人的“圆形”革命,从而画上了“人的发现”的完整句号。

上面说过,我国五四文学革命借用了西方的口号,同样动摇了千年沿袭不变的旧道德和旧秩序,但是,到此它充其量只完成了一次“半圆”的革命,因为中国无法继续走完西方“剩下”的那一大段路,无法建立起上述西方式的市场体制和人才环境。其所以如此,又正好是因为我们头上压着西方列强这座大山,所以,中国除了面临着“人的发现”这一重要课题外,还面临着同样重要的另一课题,即“民族的发现”。什么都没有比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更有说服力。在举国上下充满亡国灭种危机意识的情况下,“民族的发现”甚至早于“人的发现”。林纾在有关译作的序言中就指出过,面对列强的威胁,如不预作防备和抗争,被贩卖的“黑奴”的命运就会落在我们头

上。虽然这时的“发现”还没有纳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觉进程,但敏感的知识界毕竟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种族”正处于空前危险的境地。西方当然没有这种危机感,因此,“民族的发现”就成了一种东方特色,首先是我们这个备受凌辱的东方大国的一种特色。这一特色,也可以理解为关于我们的“人的发现”的前奏和信号,因为倘若我们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五四运动在发生的时间、规模和深度上,将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所以,在西方“人的发现”止步的地方,我们还需继续前进,因为我们身上多了一条西方列强加给的锁链,必须打碎这条锁链,才能在对等的意义上谈“人”的解放。换言之,在我们“人的发现”的话语中,逻辑地包含着“民族的发现”的潜台词,否则,我们“人的发现”的内涵将是不完整的。五四运动的大幕拉开以后,反帝、反封建立即成了它的两大主题,这是在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重新发现人、重新发现民族、重新发现我们的文化,这在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前进的道路上,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是我们民族精神上挥之不去的非常牢固的历史情结,因此,它不仅在五四运动中,而且在以后的岁月中,也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总之,在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我们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道路。重新发现“个人”、重新发现“民族”、重新发现“文化”,几乎是每一个历史关头都会“重复”遇到的主题。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来不会有谁缺席。这不是单纯的重复,因为在每一次“重复”中,都更新了“个人”、“民族”和“文化”的面貌,都展示了人的新的品质和内涵。“文学是人学”,这些最终由“人”体现出来的变化,必然会涉及和影响到学术论争的各个层面。这个“人”,也是本卷学术论辩的重要线索。归根结底,是它,是这个不断被历史塑造的“人”,创造了20世纪学术论辩的财富,并一直制约着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各种不同人们的价值取向。当我们回到历史,试着解开这个“人”字结的时候,问题也许就会变得明朗一些了。

目录

绪 论	世纪之辩:新旧文学阵营的对峙	001
	一、新旧之冲突	003
	二、中西之比较	008
	三、文白之优劣	014
	四、激进与保守的分野	018
第一章	横空出世:文化激进主义与新文学的倡导	025
	一、革命与改良策略的交响	025
	二、“活的文学”的建构	035
	三、“人的文学”的张扬	043
第二章	破旧立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批判	052
	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052
	二、“旧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	061
	三、“旧戏不能不推翻”	068
	四、黑幕小说:“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	076
	五、鸳鸯蝴蝶派:“文字上的手淫”	083
第三章	整理国故:五四文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清理	094
	一、《新潮》与《国故》的抗衡	095

二、梁启超与胡适的争辩	102
三、新文化同人间的驳难	111
四、当下的审视视角	122
第四章 重估“学衡”：学衡派的历史痕迹与现代意义	127
一、学衡派的历史选择	128
二、主流学术话语的边缘学派	142
三、传统回归时的移位思考	157
第五章 考量“甲寅”：新文学与甲寅派的论辩	167
一、时代观念的错位	172
二、文学理念的对决	187
三、文化影响的辩驳	204
第六章 百年是非：启蒙话语下的白话文论争	220
一、近代维新运动对白话文的提倡	220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白之争	226
三、文艺大众化视野中的白话文	248
四、世纪末对五四白话文的历史重估	258
第七章 世纪回眸：新文学的自我审视与反思	267
一、叩问背后的真实	267
二、重拨语言迷雾	276
三、山雨欲来风满楼	286
四、文学的自主选择	301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11
后 记	315
编辑后记	318

绪论 | 世纪之辩：新旧文学阵营 的对峙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发生于五四时期但其话题和论争却绵延于整个 20 世纪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辩。

本来，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辩在五四时期便已见分晓，它以新文学的高奏凯歌和旧文学的全军覆没而告结束。实际上，这是一场势力相差十分悬殊的论辩。在唯“新”是尚、唯“西”是从的激进思潮冲决一切、摧枯拉朽的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几乎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便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他们把对方“妖魔化”，把对方所维护和坚守的中国传统文化“妖魔化”，并由此形成了影响几乎整个 20 世纪历史的话语系统。在后来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成为了令人仰慕的文化英雄，而旧文学的维护者们则无一例外地成了不识时务的历史小丑，这似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和盖棺的定论。

然而，这段历史和这场论辩所引起的话题却并未终结。20 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围绕着新文学与旧文学论辩的论辩又一次展开。当年属于旧文学阵营的如林纾、学衡派和甲寅派等重新浮出历史水面，获得了较多的肯定性评价，昔日的守旧、保守姿态也被赋予了正面、积极的意义。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历史局限则被凸显了出来，诸如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非学理、情绪化等弊病一再受到人们的非议。林纾当时曾经写道：“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

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1]在当时，这曾被视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哀鸣，现在看来仿佛又成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预言。历史就是这样常常出现戏剧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我们无意于对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辩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更无意于做翻案文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判应当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历史的标准，即把事件和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时代之中进行分析和评价，而不能脱离或超越当时的时空背景。同时，还要看其是否顺应和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从这一标准看，历史是一次性的，是不可以假设的。二是当代的标准，即用当代人的眼光、视角、高度去审视和反思过去的人和事，总结它的得失，借鉴它的经验，吸取它的教训。从这一标准看，历史又是可以重现、假设和追问的。我们应该拥有后见之明，应该理直气壮地当好“事后诸葛亮”。这样，我们才可能避免少走弯路或重蹈覆辙。历史的标准和当代的标准是紧密联系、不容分割的：一方面，我们只能按昨天的标准去评价昨天的历史；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用今天的标准从昨天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只有这样，历史的反思才显示出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概念是沿袭历史上和学术界所长期使用、约定俗成的概念。事实上，新文学阵营中的同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并非一致，而旧文学阵营中的国粹派、学衡派与甲寅派等在价值观念、知识结构、人生理想等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新与旧、中与西、文言与白话三组当年论辩的核心问题上，双方阵营内部均达成了共识，双方阵营之间则形成了泾渭分明、两军对峙的局面。

注 释：

[1]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第80—8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一、新旧之冲突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旧转型期。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旧世界迅速崩塌的情形，又向人们许诺了一个新世界即将到来的前景。人们面对旧时代混乱、危亡的现实，对现有的和原有的一切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痛恨，对新的和未来的事物充满了憧憬与期待。人们渴望中国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变局与机运无穷的新时代。此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进化论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乐观的前瞻意识，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鲁迅的那句名言“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1]，是当时人们对进化论最通俗、最普遍的认识与表述。陈独秀也说过：“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2]于是，抨击、告别旧的，欢呼、迎接新的，成为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文化信仰。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也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核心内容。这样，新旧之间的冲突，在五四时期被空前地放大和突出。当时，人们争做“新青年”，追逐“新潮”，敲响“晨钟”，渴望“创造”，急切地希望把老大的中国改变成“少年中国”，满怀热情地期待着“新世纪的曙光”。可以说，对“新”的崇拜，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甚至上升到了唯新是尚的地步。

新文学阵营与旧文学阵营在新旧问题上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对“新”、“旧”这一对时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差异。

对于新文学阵营而言，“新”代表着晚近的先进的事物，代表着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旧”则是落后的腐朽的事物，是应